

## 〈書評〉

# 文本的张力与界限

——《弱者的武器》读后

杨 雅 丽

**摘要:**《弱者的武器》是一部经典的农民政治研究文本，其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和思考极具价值。该着通过引入人类学家的视角探究农民日常反抗的政治问题。首先，斯科特在田野调查所搜集到的隐蔽文本展现了农民的下层视角，有别于以往公开文本中的精英视角。其次，该论著借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分析政治科学中的权力关系和国家视角，进一步反思“反抗”、“霸权”等概念，驳斥了“底层无政治”的观点，从而提出日常抗争的政治概念。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为历史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斯科特；日常抗争；弱者的武器；跨学科；文本

**要旨:**『弱者の武器』という本は、農民政治研究に関する、かなり権威／価値がある書類であり、その中で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の運用と思考パターンは大きな価値があると思う。この本では、人類学的視点に基づき、農民の日常的な反抗に関わる政治問題の研究を行っていた。まずスコットは、運用したテキストの転換によって、従来の草の根レベルに関する研究のエリートの視点と、公開された文書に示されたエリート主義的見解を脱し、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で収集した公開されないテキストを通じて、農民の草の根レベル的見解を示した。次、スコットは人類学的手法を借用し、政治科学の権力関係や国家の視点から再分析を行い、「抗

議」、「覇権」などの概念について、更なる批判的な検討を行った。その結果、「草の根レベルでは政治がない」の見解に反論し、「日常的な闘争」という新しい政治的見解を提出した。この成功した学際的研究はまた、人類学は歴史研究に応用できるという可能性を示した。

キーワード：スコット、日常的な闘争、弱者の武器、学際、テキスト

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思考角度和思考路径出现较大的转变，从宏观的大框架叙事及“史学即史料学”的认知，转向带有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的跨学科的总体研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敏锐地指出20世纪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应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进行合作，历史学应该“优先与人类学进行对话。”<sup>1</sup>历史学依赖于社会生活中有意识的文本表达进行研究，人类学则通过田野调查考察社会生活无意识的基础，两种视角实行互补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各种权力关系。<sup>2</sup>将人类学家的视角引入历史学，也使得历史学重新将对“人”的考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长时段、静止的、结构式的历史研究框架受到了历史学家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新文化史的转向尤为强调“视野向下”：通过个体、细微的观察和描述透视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和世界，将“人”带回到历史的场景中，解构现代权力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研究、微观史等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其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和底层研究学派（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or 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国内又译为“庶民研究”）影响重大，二者共同构成底层抵抗研究的理论源泉。<sup>3</sup>相比之下，斯科特的研究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更大。斯科特对农民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通过《农民的

---

1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包伟民编选：《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 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3 二者具体的差别可参见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道义经济学》（耶鲁大学1976年版；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弱者的武器》（耶鲁大学1985年版；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支配与抵抗艺术：潜藏剧本》（耶鲁大学1990年版；南京大学2021年版）、《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耶鲁大学1998年版；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以及《逃避统治的艺术》（耶鲁大学2009年版）这几部重要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构建起了基于生存伦理的“日常形式的抵抗”，即“下层政治”（infrapolitics）。

虽然斯科特常常作为人类学家被提及，但他并非人类学出身，而是政治学出身。他在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所攻读的都是政治学，同时他还在缅甸的仰光大学（Rangoon University）旁听过经济学的课程。在斯科特早期的著作中，并不重视田野调查。他的早期著作《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 in Malaysia: Reality and the Beliefs of an Elite*, Yale University, 1968）、《比较政治腐败》（*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 Yale University, 1972）都是政治学的理论著作。甚至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也未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也成为他在尝试探讨农民的生存与反叛问题时的遗憾。而这一遗憾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得到了弥补，通过塞尔达村庄的田野调查，斯科特不再局限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抽象性探讨，转而从农民生活经验中对阶级和意识形态进行总结。<sup>4</sup>斯科特从“政治学家”逐渐转变为“人类学家”，而跨学科的视角也让斯科特在“底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

斯科特的理论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弱者的武器》被广泛地谈论。<sup>5</sup>如前所述，《弱者的武器》既是一本人类学著作也是一本政治学著作。该论著不仅洞见农民日常反抗背后的阶层与意识，也对前人的研究范式进行创新。斯科特对前人研究范式中的“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和

4 James C. Scott, "Afterword to 'Moral Economies, State Spaces, and Categorical Viol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7, No. 3(2005), pp. 395-396.

5 对于《弱者的武器》的相关研究，有着作述评、理论介绍和分析、概念解读与重构以及思路 and 观点借鉴等。仅由知网粗略搜索便有48篇，涵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赘述。

它们之间的一定类型的极其有力的逻辑关系”进行修正。<sup>6</sup>本文拟从概念、原则及其逻辑关系分析《弱者的武器》如何借用人类学方法进行政治学研究，从而进一步思考如何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

## 一、概念的阐释：“弱者”与“武器”

斯科特一直关注政治、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过往的研究中，农民反叛是由于剥削引起的，剥削使得农民无法生存致使农民奋起反抗。实际上，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还有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中提出对于贫农和佃户来说，生存的要义并非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风险最小化，争取最低限度的生存，即“安全第一”原则。因为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低，他们无法抵御外部风险，这就需要提高了外部对个人生存保险的重要性，同时要要进行风险转移。家庭之外村社内部的互惠互助就发挥了保护者的作用，它有效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益，降低其生存风险。村社内部的互惠保障中存在着对富裕者的道德要求，即在互惠基础上结成的所有共同体成员都必须得到最低满足的需求。如此一来，生存保险的提供并不局限于村庄内部，还与外部的社会精英建立联系。基于道义经济的生存伦理展现了下层政治逻辑与精英政治逻辑的不同，表明农民也具有“抵制精英价值”的亚文化。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延续了这种思考，更为深入地探讨道德意义和反抗在农民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基础。

斯科特首先展示了赛达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村庄中总有两类人会受到批判，一是最没权没势的穷人，一是有权有势的富人。他们相互指责，前者被认为是“贪心穷人”，后者被称为“贪婪的富人”，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才是违背了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人。对于穷人而言，富人应该慷慨承担起更

---

6 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思想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多的村庄责任，包括对穷人扶助和不算计他人的土地；对于富人而言，穷人应该是言行一致且忠实的劳力。<sup>7</sup>村庄内部通过象征性的声誉和评说来维护村庄内部的平衡：穷人会因为贫穷和小偷小摸的行径受到鄙视，富人因富裕和不慷慨而受到贬斥。因为经济实力的不同，村庄中这种象征性制裁对富人和对穷人的影响不同，穷人会因坏名声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富人则不受物质制裁，同时可以将他们认为的合适行为施加给穷人，这也就导致了象征性制裁出现的形式不一——对穷人拉扎克多是当面讽刺和对富人哈吉则是背地诽谤，形成了台前与幕后的双重面孔。之所以出现两种形式，是因为穷人害怕有权势的富人对自己进行惩罚，从而损害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在“台前”充满权力的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遵从是虚假的，穷人对富人的遵从在相对安全的“幕后”私密空间中发生了逆转。斯科特进一步指出，“村庄精英继续控制着公开的‘舞台’。公开的象征秩序通过表面的遵从得以维系，它不会遭到公然挑战。”<sup>8</sup>

这一现象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穷人（农民）的语言、行为和动作更具隐蔽性。即便再有怨言，他们都会按照传统的习俗或富人的“要求”进行，表现出对村庄精英的尊重。通过避免“公然违抗的不利”，保留内心的不满，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之下“最低限度的遵从”。<sup>9</sup>以上这些日常中看似平常又矛盾的东西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文本。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斯科特发现了公开的集体反抗之外的历史，即被统治一方并不完全按照精英阶层所希望的那样行动和思考，双方思想只在非公开场合中相互碰撞，从而维护了村庄的表面平和。

斯科特所谓的“弱者”（subordinate）既是指塞卡达村庄中的穷人（农民），也是指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从属群体。这一定义与底层学派所关注的对象（即 subaltern）是一致，但在以往的底层研究中，学者大多强调底

---

7 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8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29页。

9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31页。

层群体的公开行动，以此反对精英阶级的霸权主义。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底层群体无组织、非公开的行为，对此进行悲剧性叙事。底层学派普遍认为底层群体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盘散沙，在资本的冲击下，“其社区和原有纽带趋于消解，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也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sup>10</sup>对此，斯科特表示反对。他指出从属阶级存在非公开的反抗行为，因此弱者也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他认为阶级意识并非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完全的人的方式、以特殊的个体和群体方式、以特定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式出现的。”<sup>11</sup>他继而指出：农民的反抗并非是单一的集体性直接挑衅。面对不公时，大多数农民尽其所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经常性反抗”。他们的“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sup>12</sup>这样一来，受到报复可能性小，风险低——符合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逻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穷人并不完全认同富人所规定精英话语体系，他们只是表面顺从。他们在非公开场合的谈论表明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次文化，而这种谈论的本质是他们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斯科特在反思以往抗争理论不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了农民的“社会运动”，通过深入下层近距离观察农民的政治图景，使得日常反抗的场景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他将底层研究中的精英视角转为以农民为本的下层视角，驳斥了“底层无独立的阶级意识”的观点，指出弱者不仅有“武器”（阶级意识）而且能够有效使用“武器”进行抗争，从而提出日常抗争的概念。

---

10 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5、221页。

11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52页。

12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35页。

## 二、逻辑关系的挖掘与思考

如果承认农民在斗争过程中有阶级意识，那么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农民的阶级意识从何而来？阶级意识在不同情况下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阶级意识与行为的关系如何？斯科特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sup>13</sup>单一的剥削理论并不能满足解释农民抗争的需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民社会的组织模式、经济结构和文化特征以及地主阶级和国家的作用等等。<sup>14</sup>

社会怨恨的心理根源在于“相对剥夺感”。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与人们反抗的可能性成正比，也与反抗行为的破坏性成正比。<sup>15</sup>斯科特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塞达尔村民的“相对剥夺感”与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有很大关系。这项“绿色革命”本是一项利民政策，通过农田水利灌溉项目的搭建促进双季稻的种植。塞达卡村便位于灌溉项目旁，该村是边疆新移民区，阶级关系简单且国家并不直接剥削农民，单一的水稻种植模式使得村庄的经济具有脆弱性。

在“绿色革命”之下，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一部分受保护的中产阶级在崛起。首先，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耕种面积的减少，土地价格变高，小佃农的租佃成本增加。其次，商业化模式的引入使得现金地租取代谷物地租、“死租制”代替“活租制”，进一步增加小佃农的租佃风险。与此同时，大农场数量不断增加。再者，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机械的引入进一步减少了农业的人力需求，同时也减少小佃农做短工的机会。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

---

13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55页。

14 P. L. Berger, "Review of Facing Up to Modernity: Excursions in Socie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2(1979): pp. 617-618.

15 Todd Landman,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Routledge, 2008), p. 132.



和雇佣方式使得佃农在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逐渐失去了与雇主的斗争资本。拾穗行为的减少、短工工资的缩水也使得佃农家庭额外收入减少。至此，富人和穷人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即雇佣劳动和租佃关系已经近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大土地经营者组成的商业阶层和数量众多的、只能被松散地称为“半无产者”的群体。

原有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贫富差距的增加让穷人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与不满。一方面，在巫统统治下，农会不公地使用政府生产资助政策，使得资金进一步流向富人，村庄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机械技术的变更、市场关系引入使得建立在雇佣关系的道义经济遭到破坏，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纽带被削弱。其后果是富人对村庄生活的社会控制不断减弱，占据领导地位的富人所支配的资源越来越依赖国家。

简而言之，社会变迁冲击了原有的较为和谐的乡村阶级体系，领导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的意识差距越来越大。传统的农村制度下，富人通过对穷人的援助和保护等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富人的“义务”奠定了附从关系的规范基础。地主与佃户关系中的互惠程度维系着乡村权力的平衡。但随着雇佣关系减少、租佃关系变化、慈善行为缩减，双方之间的社会道德纽带逐渐瓦解。为此，穷人和富人都在道德体系和利润最大化两者之间做出不同程度的反抗。在象征性的场域中，富人在言说中尽量缩小现实贫富差距，并指责穷人过于懒惰。而穷人往往会夸大这种贫富差距，认为富人过于富有却不帮助穷人。实际上，是穷人希望富人能在原道德规范下承担起对穷人的义务，而这正是富人所避而不谈、极想远离的桎梏。

这一争执在联合收割机最为明显，资本主义与生产技术的冲击导致了穷人和富人之间更为直接的敌对关系。对于富人来说，“原有的体系使富人陷入一系列的对贫穷邻居的传统社会纽带与义务当中，而在新体系中，只要同机器捐客签署一个一次性的不带人情味的合同就够了。”<sup>16</sup>使用人工还是机器的背后暗藏着利益成本与道德成本的双重考量，然而富人只看到了利益成本

---

16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191页。



的方面。这种利益最大化的简单处理破坏了乡村的“剥削水平”，“一些人的权力与另一些人的脆弱地位，促成了违反普遍公正标准的交易”，从而导致旧有社会生存机制的瓦解。<sup>17</sup>

农民对社会现实的适应是一种生存政治而非革命政治。<sup>18</sup>当权力的发展进一步威胁到农民的生存底线时，就会激起农民的道义性愤怒。若想全方位地理解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必须同时理解穷人所面临威胁的全部维度。总的来说是三个层面：“看得见的永久贫穷的威胁；同样明显的在社区中有意义和受尊敬的生产角色的丧失；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本村被确定为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承认和文化尊严的丧失。”概言之，在冲击之下，农民面对的是生存权力和道义权益的双重边缘化。因此，“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sup>19</sup>

“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sup>20</sup>正因如此，穷人通过“发明绰号、恶意的谣言、联合抵制筵席、并把当前的事态归咎于富人的贪婪与吝啬，从而象征性地瓦解了富人自我授予的社会地位时，他们同时也在坚持自己对地位的要求。”<sup>21</sup>这种口舌之争也构成了“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斗争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相关，对象征权力的争夺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而是会转为资源斗争。为了维护统治，精英阶层也会适时让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农民的要求。这是因为旧精英阶层的社会权威有赖于底层对其地位和财富的认可，这使得不具备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农民拥有抗争所需的权力资源。有效抗争方式维护了生存环境的动态平衡，使农

---

17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18 James C. Scott, "The Erosion of Patron-Client Bonds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1972): pp. 5-37.

19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292页。

20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第8页。

21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292页。

村社会能够较为平稳地发展。

整体而言，斯科特指出了作为下层的农民的阶级意识来源于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及文化认同。下层追求生存和个人利益，由此形成反抗的关键。他们在被剥夺和被剥削经历中意识到存在和经济相反的利益并围绕之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发现自己作为阶级而存在，产生“阶级意识”。在旧村庄中，农民基于互惠原则的生存伦理思想因遇到外部冲击而不断加强。一旦危及生存利益，他们便会利用象征性资源，诸如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以及公开回避等进行反抗。通过歪曲事实、创造剥削词汇表等方式，农民不断增加自身的符号资本，促进彼此间的身份认同，同时削减抗争对象占有的符号资本，使自己的行为与诉求正当化。<sup>22</sup>在面对外人时，他们还会为其提供相关的认知与评价准则并且动员他们支持自身行动，进一步将自身的符号资源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优势。农民通过默认一致的方式形成一种社会约束力，构建下层的反抗途径。

### 三、理论的反思与超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学者热衷于研究大规模乡村叛乱问题，较少关注下层农民的日常反抗。这一方面与资料的留存有较大的关系，相关文献资料多为叛乱资料，缺乏对农民主动发起反抗的深入记载；大部分的公开文本是以精英标准对乡村贫困人口进行观察和记录的。另一方面，与西方学界的理论范式转化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从强调怨恨和剥削的传统范式向资源动员范式转化，后来又继续向新社会运动范式过渡。在西方学界“寻找激进行动者”的传统中，正统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工人阶级，但工人运动在战后西方世界已经不居主流；新一代左派理论家们又找到了知识分子、学生等他们认为能代表“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阶级”的

---

22 对于弱者反抗路径的形成和思考，参见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下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彭斌：《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反支配的权力为视角的分析》，《江海学刊》2016年第3期。

人。印度底层研究的兴起则以“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和“工人农民运动的失败”为背景的。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主义，认为底层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sup>23</sup>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斯科特借用人类学和底层的视角重新思考农民的反抗行为，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摒弃了以往的精英主义政治观，自下而上思考农民问题。他认为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东南亚传统小农从不具备革命的抱负和胸怀，“小农的文化特点决定了日常反抗方式的现实性和策略意义。”<sup>24</sup>斯科特拒绝之前那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抗和革命”为主的反抗定义，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索要（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sup>25</sup>重新定义反抗的背后是对底层群体的政治地位的再思考，斯科特对过去底层研究中底层是无意识、无效的政治阶级的观点进行驳斥。他认为意识形态原则最常表现为对具体社会群体的认同和直接经验，正因如此，底层的信念往往更加支离破碎且内部一致性较差。<sup>26</sup>在现实文本的记载中，底层群体缺少组织与合作且多出于自利而进行反抗。实际上，正是因为底层群体在生存斗争中的需求，他们必须在国家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之间进行斗争和周旋，从而塑造出另一种政治模式，即所谓的“底层政治”。

斯科特进一步思考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斯科特虽然不否定马克思的传统观点，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但问题是统治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他们自己构想的公正社会秩序强制施加在被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思维认知上。在公开场合中，弱者所表达

---

23 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22-224页。

24 白文静、蔡燕航：《从斯科特的视角看下层政治的逻辑》，《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40页。

25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351页。

26 James C. Scott, *Decoding subaltern politics: Ideology, disguise, and resistance in agrarian politics*(Oxon: Routledge, 2012), p. 11.

的行动是否直接能代表他的认知？斯科特的下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葛兰西的霸权概念（hegemony）<sup>27</sup>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sup>28</sup>、神秘化（mystification）<sup>29</sup>等概念。斯科特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强调了统治阶级需要控制物质生产方式和象征性生产方式两方面的需求，但它在实际过程中并不能完全控制被统治阶级，因此，霸权理论在解释实际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方面存在漏洞。<sup>30</sup>与无产阶级不同，小农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根植于他们的实际需求和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形成特定的反抗模式。农民阶级作为一个古老的阶级，拥有自身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如非正式的宗教学校、仪式和节日等。小农并非无力应对精英意识，而是通过将精英意识“去神秘化”来抵抗。他们试图理解和揭示精英阶层的思想和话语，使之不再显得神秘和不可接触。虽然农民无力阻碍精英价值主导的强有力的国家行为，但是他们试图削弱精英话语的权威性，从而在社会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比如，小农可能采取一种“沉默共谋”的方式，即通过沉默和共同行动来对抗精英统治，进行“无声地反抗”。他们通过说坏话、开小差等协同行动实现对精英的某种程度的制衡。

---

27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一个具有总体性意蕴的概念，它不仅指伦理与道德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还指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霸权。作为下层阶级，要获得霸权，除了一种经济与政治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获得文化领导权，这需要将大众的共通感提升到一种自觉的理性，即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在这个过程中，受政党领导的知识分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霸权主义的核心论述点是国家的统治可以通过暴力或者强制，但是对于市民社会的控制必须诉诸文化，建立文化的领导权和同意之上的，因此领导力量会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让步和妥协，寻求咬合点，与被统治者达成一致。霸权主义的特征是威权与服从、合法性。受此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研究都关注无权者如何通过自己对文化的解读和使用，对权力进行抵抗，并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可参见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磊著：《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 “虚假意识”并非指意识的非真实性或虚假性，而主要指人们对意识的两种错误看法，一是那种把意识看做具有独立起源并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概念，二是那种视意识为经济的附属物进而将其视为毫无价值的看法。

29 由于农民的宗教观念或社会意识，他们承认这种剥削是社会制度的正常的、甚至是合理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制度的宿命论。

30 郭于华：《译后记》，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481页。

另一方面，弱者用以反抗的逻辑和依据也与上层的信仰体系有关。精英阶层为了得到从属阶级的顺从会将各项制度描述成是有利于从属阶级利益的行为。因而当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由上而下进行传递的过程中，社会底层会依据自身的利益进行解读和重构，并以此为抗争的依据。当承诺与实践呈现较大的差异并危及底层的生存之时，他们便会不由地使用“弱者的武器”。换言之，不是一定要有对立意识的指导才有革命行为，有时候革命更多产生于“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sup>31</sup>

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坚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精神与实践”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因此，有时候这种反抗也构成汪洋大海中的暗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

“沉默的共谋”也展现了弱者参与政治的界限。斯科特所强调的农民日常抵抗的方式，主要指的是那些不拥有法律表达权力的人。<sup>32</sup>他们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还受制于村庄中的权力网络。他们缺少抗争的渠道和力量，固守传统的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sup>33</sup>在庇护制盛行的东南亚社会中，农民与精英阶层形成了紧密的依赖关系，精英阶层以满足大多数人生存为条件，形成一种庇护关系。这种庇护关系常常表现以社会合作的方式加强双方之间的“纵向团结”。<sup>34</sup>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经济理性不断冲击原有的庇护关系，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伦理在不断瓦解。

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农民要发起反叛总是不容易的。因为反叛所带来的生存风险更胜于受剥削所带来的痛苦。农民要“依靠本村资源而活着，而

---

31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426页。

32 王晓毅、渠敬东：《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34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1(1972), pp. 91-113.

这种活着的取得，常常要以丧失身份和自主性为代价。”<sup>35</sup>这种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社会系统本身需要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维持其运转。通过财富、权力和声望所导致社会分层也形成了各个阶层不同的文化、行事准则和逻辑。由于权力的不对称，无论是常规的顺从还是常规的反抗都是在算计村庄的权力格局和回报的眼光下做出的。<sup>36</sup>这种算计是相互的，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都在不停地探索，以便找出什么是他们能侥幸做成的事，以便试探和发现服从和不服从的界线。”<sup>37</sup>

#### 四、余论

斯科特的下层视角自提出以来便引起较大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底层民众”在政治层面的“失语”状态。在实地的田野考察中，他发现运用理性行动者模型去理解农民抗争问题存在缺陷——理性人的假设忽略了人类情感文化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忽视乡土农业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观念，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都倾向于专注于书面记录，农民只有在对统治精英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刻、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中才能获得历史可见性。<sup>38</sup>

任何一门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外部观察者的解释与被阐释者的解释之间的有力交锋。<sup>39</sup>斯科特运用人类学的方法重新解析政治科学中对权力关系和国家的传统关注，同时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弱者的武器》一书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斯科特的人类学数据的内部有效性。<sup>40</sup>

---

35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第9页。

36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第341页。

37 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8页。

38 James C. Scott, *Decoding subaltern politics: Ideology, disguise, and resistance in agrarian politics*(Oxon: Routledge, 2012), p. 60.

39 张丹丹：《环境、动因与形式：詹姆斯·斯科特抗争思想的内在逻辑》，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政治学系，2019年，第66页。

40 Elisabeth and Jeanwood, “Field Research,” in Carles Boix(eds): *Oxford Handbook of*

换言之，田野调查形成的一手资料使得斯科特能够更好地了解农民的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为抗争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研究视角。但斯科特也指出了人类学研究的不足：“人类学往往缺乏历史深度。它没办法解决特定环境如何形成、某个事件为何偶然发生以及它可能消失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最终是一门颠覆性的学科。”<sup>41</sup>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不仅提供了日常抗争的下层政治概念，也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利用新文本，转换新视角，提出新概念。

首先，历史学的研究文本不应该只局限于档案、报刊等公开文本。因为公开文本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记载，而忽略了从属群体的记载。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方式不断扩展文本的来源。与此同时还需进一步改变以往对史料的粗略使用，借鉴人类学“深描”的方式，对有限的资料进行密集而细致的解读，以文化解码的方式对细节进行追问以探测“常态”和整体的运行。既可以像柯文那样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进行深度解读，也可以如斯科特那般检验社会中存在的不同文本。无论是那种解读的方式，都需要注意“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

其次，转换视角不单是改变观察角度，更重要的是改变思考的方式，跳出思维定势。由于历史的凝练性表达、人们对清晰叙述的渴望以及精英和机构展示秩序和目的性的需求，导致历史有时会呈现出虚假的因果关系。<sup>42</sup>若以多重视角审视历史，会发现民间的叙述和官方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历史并非具有清晰的进程而是混沌一片的。过去，历史研究者常立足于人类的理性去探索人类生活的轨迹以及呈现一般性的社会生活经验，如今史学并不完全将人放入整体结构中，而是关注人的主体性。有学者提出，“在人／事关系的丰厚历史世界中，将人与人、与物、与制度、与事件、与复数的意义衔接起来。……不是寻求新的大历史，而是透过富有层次的人与事，牵连出

---

*comparative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3.

41 James C. Scott, *Decoding subaltern politics: Ideology, disguise, and resistance in agrarian politics*(Oxon: Routledge, 2012), p. 66.

42 詹姆斯·C·斯科特著，袁子奇译：《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1页。



背后更丰富多样的过去，如同多角度观察涌到岸边的浪花，去发现大海的深邃，或许可为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sup>43</sup>

对于历史学而言，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一是理论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后者意义更为重要。<sup>44</sup>新理论的创建通常表现为关键概念的提出。关键概念是理论逻辑和原则的凝练和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研究范式的创新总是基于前人理论成果之上，只有反思前人理论成果不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因此，新概念的提出是有“本”可依的。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方面受到葛兰西霸权政治的启发，一方面又与之前的底层政治学派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理论范式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而在使用和理解的时候不由得带入阅读者自己的主观意识，忽略了原来理论体系的潜在逻辑和前提假设。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对葛兰西的霸权政治进行深刻的批判，此后他发现自己误解了葛兰西的霸权思想。葛兰西所探讨的是具有投票权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并非没有法律表达权力的人。他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理论，用主宰（domination）来替代霸权（hegemony）。<sup>45</sup>可见，理论的提出源于研究者所依据的文本，他者在谈论或使用理论时需注意其适用范围。

在使用斯科特“弱者的武器”时，也需要注意这一概念提出背后的局限性。“弱者的武器”中所指代的农民是传统思想捍卫者，是被排斥于现代体系之外。这一理论的推导与其研究的对象密切相关，他所研究的村庄基本是一个较为封闭、传统、稳定的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道义共同体内，这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时段导致了不同形式的抗争，而学术界在理解这些抗争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框架。有学者认为弱者的武器可以是法律

---

43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7-308页。

44 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1页。

45 James C. Scott, “Afterword to ‘Moral Economies, State Spaces, and Categorical Viol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7, No. 3(2005), pp. 395-402.

或政策。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了“依政策反抗”和“合法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强调抗争在政策框架内的合法性。与之相似的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规则模式”，这里的规则也主要指国家法律和政策。于建嵘的“以法抗争”更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李怀印关注“正义抵抗”和“正当抵抗”，强调道德和法律维度。应星的“以气抗争”与李怀印的观点类似，但应星更侧重于情感在抗争中的作用。高玉凌的“农民‘反行为’”进一步提出，在强大生存压力下的“弱势”一方常常会以表面“顺从”的姿态获得“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自己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行为。这种“反行为”是农民的“非抗争”而不是“反抗”，目的是追求短时间内的一种无分胜负的状态。此外，一些历史学家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提出了新概念，如“文化的权力网络”和“被统治的艺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抗争的文化和艺术维度。

然而，尽管出现了多种解释框架和新概念，这些研究依然受限于斯科特的“下层视角”和“下层政治”逻辑。历史学的任务是跳脱传统观点，提出对其他学科有价值的概念，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在这个方向上“上下求索”，为知识的进步作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 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思想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2 白文静、蔡燕航：《从斯科特的视角看下层政治的逻辑》，《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 3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下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
- 4 Elisabeth and Jeanwood, “Field Research,” in Carles Boix(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6 和磊著：《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 7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7-308页。
- 8 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 9 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11 P. L. Berger, "Review of Facing Up to Modernity: Excursions in Socie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2(1979).
- 12 彭斌:《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反支配的权力为视角的分析》,《江海学刊》2016年第3期。
- 13 James C. Scott, "The Erosion of Patron-Client Bonds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1972).
- 14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1(1972).
- 15 James C. Scott, *Decoding subaltern politics: Ideology, disguise, and resistance in agrarian politics*(Oxon: Routledge, 2012).
- 16 James C. Scott, "Afterword to 'Moral Economies, State Spaces, and Categorical Viol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7, No. 3(2005).
- 17 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 18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 19 詹姆斯·C·斯科特著,袁子奇译:《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 20 王晓毅、渠敬东:《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 21 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 22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包伟民编选:《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 23 张丹丹:《环境、动因与形式:詹姆斯·斯科特抗争思想的内在逻辑》,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政治学系,2019年。
- 24 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